

从范蠡与亚里士多德社会政治思想比较 看中西方文化差异

黄庭月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范蠡和亚里士多德是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的两大政治家。二者均有务实精神,都主张让人民富裕。范蠡主张君主专制政体,亚里士多德主张民主政体,但亦主张权力集中,反对滥用民主。他们政治思想的相似与差别,表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

关键词:中西文化;务实;富民;权力集中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40(2001)03-0017-02

范蠡与亚里士多德皆为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四世纪出现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虽然他们出生在中国和希腊两个不同的国度,但他们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却有许多共同之处。今就范蠡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以求教于学术界的前辈和同仁。

一、二者皆有务实精神

公元前494年,中国处在春秋末年。吴、越两个诸侯国发生夫椒(今江苏省吴县太湖中有夫椒山)之战。越国大败,越王勾践仅以5000人被围困在会稽山上,越国基本灭亡。从此越王勾践开始任用范蠡以执国政。范蠡在帮助越国复国过程中的政治指导思想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颇有一些相同之处。

范蠡认为,越国当时兵临城下,被围困在孤山,必须以最谦卑的姿态去哀求对方的同情,卑辞厚礼向敌人求和,生存下来而谋求今后的发展才是目的。在范蠡的策划下,越王勾践以举国为臣妾的条件向吴王夫差求和,以换取越国不灭。夫差终于答应了越王的要求。在会稽山上,范蠡认为恢复越国才是目的。他和勾践一起,吊死抚伤,十年教训,十年生聚,终于完成了复国大业。

越复国以后,范蠡以异常的冷静认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以同患,难与处安”。于是,“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后来他离开齐国,又到定陶,三致千金,为陶朱公。范蠡恢复亡越、经商致富,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商业巨富。他成功的原因在于他做所有事情注意其效果。范蠡说:“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对范蠡来说,他的计谋和策略,无论施于国或用于家,皆是为了达到成功的目的。范蠡是一个非常务实的思想家。

亚里士多德有与范蠡有着相同的务实精神。亚里士多德说:“每种技艺和每种研究,都被认为是追求某种好处,同样

的,每种行为和事业亦复如此。……医术的目的是健康,造船术的目的是船只,战略的目的是胜利,理财术的目的是财富。”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所从事的一切活动,其实就是为了达到某一个目的;从事的事物或活动不同,所期望的目的也不相同。目的要高于活动或行为。“产品胜于活动乃产品的本性”。正因为有了某种目的,人们才去追求。目的是追求的结果。

亚里士多德还说:“马的美好德性使一匹马本身好,又使它善于奔驰,使它可被很好地乘骑,使它善于等候敌人的攻击。因此,如果在每种场合都是如此,那么人的美德也将是既使一个人本身好,又使它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的那种性格状况。”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与范蠡有着共同的认识。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的活动和行为都仅是一种手段,而达到目的才是人们所追求的结果。范蠡用的所有计策,如:卑辞厚礼以求和,苦身戮力,卧薪尝胆以发奋图强。这些只是活动和手段,而恢复越国,打败强吴才是目的。范蠡和亚里士多德在务实精神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

二、二者皆主张国家应减少穷人,增加中等阶级人数

越国复国过程中,范蠡提出只有让百姓富庶起来才能使国家富强。他认为“地”是使国家富庶的根本,“唯地能包万物以为一,其事不失。”“田野开辟,府仓实,民众殷,无旷其众,以为乱梯。时将反,事将有间,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无间,时无反,则抚民保教以须之。”范蠡认为,一个诸侯国必须有充足的粮食,让百姓生活好,不要让他们无业可做,空虚度日,以生怨乱。百姓们皆达到中等的生活水平,这样才能使诸侯国强大。

范蠡仗义轻财,在齐国经商致千金,临走时“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居定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范蠡轻掷千金,分给穷苦的乡亲朋友,表现了他在财富上的平等思想意识。

收稿日期:2001-07-06

作者简介:黄庭月(1974-),女(汉族),河南开封人,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教师。

亚里士多德说：“一个城邦应该尽可能由平等和相同的人们组成，而这种人一般地就是中产阶级。因此，那以中等阶层的公民组成的城邦，在成分方面，即在我们认为国家的结构自然地由之构成的成分方面，可以说是组织的最好的了。”亚里士多德提倡由中等阶级的人组成政府。他认为在一个城邦国家中，中等阶级的人数必须占绝对优势，控制着绝对的权力，这个国家才能稳定、发展和繁荣。否则，这个国家就会产生祸乱。他说：“因为当没有中等阶级而穷人人数大大超过别种人的人数的时候，祸乱就发生了，国家不久也就完结了。”

亚里士多德这种认为国家公民应以中等阶级，也就是比较富裕的平民为主要成员的看法，与范蠡在会稽山上为越王勾践制定的谋略是相同的。在会稽山上，越国“令孤子、寡妇、疾疹、贫病者，纳宦其子。其达士，絮其居，美其服，饱其食，而摩厉之于义。四方之士来者，必庙礼之。勾践载稻与脂于舟以行，国之孺子之游者，无不饥也，无不歆也，必问其名。非其身所种则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织则不衣，十年不收于国，民俱有三年之粮。”勾践的复越之策是在范蠡思想指导下而进行的。勾践君臣被困在会稽山上，赈贫吊伤，抚恤嫠寡，为他们的儿子提供就业机会，不向国内百姓收取赋税，使“民俱有三年之粮。”这种做法其实就是降低诸侯国中穷人的数目，增加“中等阶级”的比例。在公元前五至公元前四世纪，越国和希腊，范蠡和亚里士多德，东西相隔万里的两个国度里，两个政治思想家的思想及治国策略是一致的。这绝不仅仅是巧合，而是人类相通的思想意识。

当然，亚里士多德主张中等阶级的人们掌握国家政权，而越国君臣只不过想利用中等阶级的人数增加，使其国家稳定、发展，从而向吴国报仇。这是范蠡与亚里士多德在政治思想上的不同之处。

三、二者对国家政体的主张不同，但都主张权力集中

范蠡作为中国春秋时期的政治家，诸侯国大臣，他自然主张君主权力的集中。范蠡为勾践谋划复国大计 20 余年，最后竟灭吴国。在这些年中，范蠡劳身焦思，功劳盖世，但他从不敢越雷池半步，去夺取越王勾践的权力，从未忘记自己是勾践的臣下。所以当会稽之耻已雪，吴国被灭，国仇已报，范蠡致书勾践说：“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会稽，所以不死，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请从会稽之诛。”他认为，国君有忧，臣应当为国君效力，国君受辱，臣应为之而死。范蠡的思想具有中国儒家的那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思想。他认为，国君的权力在诸侯国中凌驾于一切臣民之上。

亚里士多德主张民主政体，主张中等阶级掌握政权，这是与范蠡的不同之处。亚里士多德反对富人执政，他说：“那些

享有太多的幸运、体力、财富、朋友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人，是既不愿意也不能够服从政府的。这种原因是从家庭开始的，因为他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们长大的那种豪华奢侈的环境，他们就从来没有学得那种服从的习惯。”很明显，亚里士多德反对富人掌握国家政权。他认为，人类最合理的政体是民主共和政体。但随着古希腊城邦民主政治出现的危机，国家首脑抽签选举，政府陷入一种滥用民主的泥淖之中。以抽签选举的方式近于荒唐，以这种方式选出来的人，往往是没有统治知识的人。雅典思想家苏格拉底就因反对这种荒唐的抽签选举，认为不能把权力交给一个毫无政治知识的普通公民手中，而被处以死刑。

亚里士多德对这种滥用国家民主制的行为也表示异议。他认为，主奴关系是天生的，是公正的。“那些低级的人，应当成为另一些人的奴仆，……对于奴仆来说，他们被奴役，不但不是有益，而且是公正的。”亚里士多德站在奴隶主的立场上，对奴隶持一种非常轻视的态度，视他们为“牲畜”。这是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糟粕，也是他主张君主权力集中的思想基础。因此，当他看到雅典民主制度的弊病后，提出君主权力的集中是自然的。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一个战斗队的长处，既在于它的秩序，也在于它的将领，而更多地是在于将领。因为不是将领依靠秩序，而是秩序依靠将领。万物都是依某种次序安排的，……万物都是与一个东西相关联着安排起来的。”又说：“对于那些主张两个本原的人来说，他们只能把其中的一个当作主宰。”当亚里士多德谈了一大通哲学道理，最后却引用了荷马的《伊利亚特》第二卷的一句话：“主事人多了糟糕，还是一人当家好。”表明了他的哲学思想的政治性。亚里士多德虽然主张民主共和政体，而在伯罗奔尼撒战后，却主张君主权力的集中。他这些主张虽然与范蠡的君主专制有一定程度的差异，但其贵族立场是一致的。

公元前五至四世纪，我国的大政治家范蠡与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思想上有相同之处。他们都有突出的务实精神，都主张富民，对君主权力集中的认识虽有程度的差别，但亦有相通之处。范蠡作为一个大政治家，他的思想更多地付诸治理国家的行动；而亚里士多德则成为希腊古典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我们对范蠡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进行探讨，对于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应该是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2] 国语[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 [3] 古希腊罗马哲学[M].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An Initial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from Fan Li and Aristotle's Political Thinking

HUANG Ting-yue

(Henan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Zhengzhou 450002 Henan, China)

Abstract: Fan Li and Aristotle are respectively politicians in ancient China and Greece. Both of them have pragmatic inclination and advocate the prosperity of the people. But Fan Li maintains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autocratic monarchy, while Aristotle that of democracy though holding 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 and opposing the misuse of democracy. The sameness and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are the product of the two culture.

Key Words: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pragmatic inclination; prosperity of the people; concentration of power (责任编辑 褚自刚)